

经济地理、政治版图与 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权力效用^{*}

——以俄罗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为例

宋国友 高群博

【内容提要】 国际政治现实中存在着有趣的不对称经济相互依赖未能产生有效权力的情形。不对称依赖较小的一方不能凭借其在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有利地位,通过使用经济手段,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进而对依赖较大的一方形成权力,从而实现自身的外交目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作者构建了一个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的新解释框架以解释该现象。在引入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的基本框架之后,提出依赖较大大国内部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的错位或者契合是影响不对称相互依赖能否在短期内发挥权力效用的关键因素。在两者错位的情况下,权力难以顺利实现;在两者契合的状况下,权力容易实现。同时,作者选取并详细剖析了2004年以来俄罗斯借助经济不对称依赖中的优势地位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一案例,以论证这一核心观点。

【关键词】 经济地理; 政治版图; 不对称相互依赖; 权力效用

【作者简介】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高群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 (2012) 09 - 0131 - 24

^{*}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笔者深受启发,特此致谢。本文的案例分析得到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当今世界是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的世界。学界对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分析主要围绕着两个向度展开:一个是经济相互依赖的安全向度,即经济相互依赖是更加有利于和平还是增加了冲突。在这一向度上,学界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大致形成了和平的积极效应、消极效应以及无关等三种主要观点。^①经济相互依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向度是权力向度。当今的世界并非是一个对称的相互依赖世界。在众多的国家间双边关系中,存在着显著的不对称相互依赖现象。所谓不对称相互依赖,借用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描述,是指“在相互依赖中,一方比另一方较少依赖对方”。经济不对称依赖的存在同样会产生重要的国际政治后果,因为“较少依赖的一方可以通过控制这种不对称依赖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权力”。^②换言之,经济不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③作为权力属性的应有之义,不对称依赖关系中依赖较小的一方可以要求依赖较多的另一方做某些它们本来不愿做的事情。^④在经济相互依赖的权力向度研究上,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不对称依赖导致权力的产生是自然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

但是国际政治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对称经济相互依赖未能有效产生权力的情形,不对称依赖较小的一方未能凭借其在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有利地位,通过使用经济手段,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对依赖较大的一方形成权力,进而实现自身的外交目标。这就造成了经济不对称依赖中的权力失效现象。本文将主要讨论这一

① 持经济相互依赖有利于和平观点的参见:Solomon W. Polachek, “Conflict and Trad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4, No. 1, 1980, pp. 55 – 78; Richard N.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John R. Oneal and Bruce N. Russett, “The Kantian Peace: The Pacific Benefits of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885 – 1992,”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1, 1999, pp. 1 – 37; Erik Gartzke, Quan Li and Charles Boehmer, “Investing in the Peac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2, 2001, pp. 391 – 438. 持消极效应观点的参见:Katherine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1, 1996, pp. 29 – 49. 持无关观点的参见:Barry Buza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imits of the Liberal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4, 1984, pp. 597 – 624; Norrin M. Ripsman and Jean – Marc F. Blanchard, “Commercial Liberalism under Fire: Evidence from 1914 and 1936,”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2, 1996/1997, pp. 4 – 50; Kenneth S. Waltz, “The Myth of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in C. P. Kindleberger, e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70.

② 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7, p. 215.

③ David A. Baldwin, “Power Analysis and World Politics: New Trends versus Old Tendencies,”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2, 1979, p. 176.

④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p. 11.

问题。

一 现有的相关理论解释及评介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尚较少涉及不对称经济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权力效用问题。但是,一些学者对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仍能对该问题有所启迪,特别是退出成本、谈判理论和经济制裁这三个方面的解释。

(一) 退出成本的解释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区分了敏感性相互依赖与脆弱性相互依赖两个方面。他们认为,在理解不对称依赖产生权力方面,相比敏感性,脆弱性相互依赖更为重要。一国的脆弱性程度越高,不对称依赖关系中的另一国就越有可能对该国发挥政治影响力。^①

马克·克里森兹(Mark J. C. Crescenzi)在基欧汉和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退出成本”的概念。^②克里森兹的理论模型假设,理性的两个国家处于一段使双方收益最大化的经济关系之中,退出当前经济关系所涉及的成本实质上就是从当前这个最优选项向下一个最优替代方案的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净损失(net cost),与这些替代方案相关的机会成本即为“退出成本”。退出成本的大小取决于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和寻求可替代经贸资源的难易程度。资产专有性与市场结构这两个经济特征可用来界定退出成本:资产专有性越强,市场结构越具有刚性,寻找替代经贸资源的难度越大,退出成本就越高。

虽然提出“退出成本”概念的初衷是为了分析国家间冲突升级的机制,但是它对于研究经济不对称依赖的权力效用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而且,退出成本作为一个衡量指标,能够同时评估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这较之基欧汉和奈的概念有了相当的进步。^③克里森兹的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为该理论是典型的国家中心主

^①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其中敏感性是指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变化之后,一国在既有政策框架之内做出反应的程度;脆弱性是指行为体因外部事件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脆弱性的程度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付出的代价。基欧汉和奈认为,在为行为体提供权力资源方面,敏感性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不及脆弱性相互依赖。

^② Mark J. C. Crescenzi, "Economic Exit,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5, No. 3, 2003, pp. 809-832.

^③ 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退出成本与国家间冲突升级——基于动态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31页。

义观 把国家视为能够理性评估经济利益得失的行为体,仍将国内经济状态视为铁板一块,没有充分重视国内政治经济的多样性对一国外交政策及国际关系的重大影响。

(二) 谈判理论的解释

哈里森·瓦格纳(R. Harrison Wagner)运用谈判理论提出,经济不对称依赖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影响力,而需要一定的条件:以经济资源换取政治让步的交易要好于它们单独从经济关系中对收益分配进行谈判的关系。他进一步阐释,“如果政治让步是威胁终止现存经济关系的预期结果,那么这一定是因为在现存关系中还存在着尚未利用的谈判能力,也就是说,要求政治让步的一方,如果它愿意的话,可以成功地从现存关系中要求到更有利于己的条件”。但是,“即使在现存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尚未利用的议价能力,可能也没有途径将之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因为可能没有可行的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让步的互利交易”。^①

瓦格纳的理论模型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和市场交易原则的谈判理论,对于解释不对称相互依赖与政治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理论路径。不过,他将一国利用经济优势胁迫另一国进行政治让步的过程视为简单的交易过程,这显然与现实世界的状况有着较大的偏差,经济胁迫换取政治让步的过程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都远非是互利的交易,而是一个胁迫方竭力改变现状、被胁迫方努力维持现状的过程。这种理论基本逻辑过度的特殊性,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瓦格纳理论模型的解释力。

(三) 经济制裁理论的解释

除了上述两种理论外,经济制裁的相关研究对研究经济不对称依赖的权力效用问题提供了更多可以借鉴的成果。这是因为经济不对称依赖的权力要真正发生作用,就必须借助经济制裁。^②在经济制裁理论中,又可细分出三种相关的解释。

1. 大国政治

当依赖较小国试图对依赖较大国使用经济手段来获取政治影响力的时候,如果出现第三方因素,特别是当第三方为另一个大国时,经济不对称依赖的权力效用也会受到影响。有学者认为,经济制裁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被制裁国强大或富裕的盟国对被制

^① R. Harrison Wagne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argaining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61-483.

^② 更为具体地说,经济制裁有以胁迫方式体现的消极经济制裁和以奖励方式体现的积极经济制裁。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都属于经济制裁的范畴。关于这两种经济制裁的深入分析,可参见 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8-42.

裁国的支持,大国的支持可以极大地补偿被制裁国因为制裁遭受的损失。^①这种情形在冷战期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而导致的制裁案例中十分显著。大多数这样的经济制裁目标涉及改变受制裁国的政权或政治体制,因此受制裁国通常能够获得制裁国的敌对势力的援助。这些补偿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受制裁国受到的制裁冲击,削弱了制裁的预期效果。

大国政治的解释应用于不对称依赖权力效用的分析上,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该解释主要适用于冷战时期,制裁的目标主要是意识形态导向,而非具体外交政策导向。其二,该解释忽略了小国的自身情况,小国在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下是大国争斗的副产品。其三,也是更为重要的,在该解释路径中,制裁发起国与被制裁国之间并不一定是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比如美国对古巴或中国的制裁,而在本文的分析中制裁国与被制裁国不仅有了深度相互依赖,而且是高度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

2. 制裁发起国的国内因素

毋庸置疑,制裁会对制裁发起国本身造成损害。虽然一些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发起制裁对制裁发起国的综合经济影响是十分微小的(制裁发起国一般都是大国),^②但如果制裁使得制裁发起国国内的选民或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公司、利益集团遭受严重损失,就很可能削弱选民对制裁的支持,大公司或利益集团也会游说政府放弃制裁。如果受制裁国了解到制裁发起国国内发生的此类变化,也会增强它抵抗制裁的决心,进而增加制裁生效的难度。以上可能情形经由时间增效,制裁发起国久而久之会因为“制裁疲劳”而放弃制裁。^③

从研究不对称权力效用这一核心问题出发,上述制裁发起国国内因素解释的最大缺陷在于,它认为在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情况下,经济制裁对于制裁发起国的影响要小很多。制裁发起国能够承受得起因为制裁所引发的本国经济损失,通常情况下不至于引发严重的国内反弹。

3. 制裁目标国的政权性质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制裁更难在独裁或中央集权的国家达到其政治目标。^④因为

① 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著 杜涛译《反思经济制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② 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反思经济制裁》,第129页。

③ Richard N. Haass, ed., *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8, p. 205.

④ Risa A. Brooks, "Sanctions and Regime Type: What Works, and When?" *Security Studies*, Vol. 11, No. 4, 2002, pp. 1-50.

独裁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本国的统治阶层不受制裁的损害,而把制裁造成的损失转嫁给国内的普通民众。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制裁可能会帮助加强独裁政府对其民众的控制能力。^①相反,如果受制裁国是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其国内选民的福利因制裁而遭受严重损害,受制裁国顺从制裁发起国政治要求的动机可能会更为强烈,因为民主选举的政府往往害怕因制裁而付出国内政治代价。该解释的不足之处是如果仅仅以政权性质为独裁或者民主这样的二分法进行分析,存在着过于简单化的问题,无法深入探究经济制裁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

综上,上述各种可能的解释确实在某些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其中最大的不足是没有直接回答经济不对称依赖情况下权力的效用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该框架的特点在于渗透至依赖较大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层面,采取“国内政治”的研究视角,突出国内因素的作用,以依赖较大国内部的“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这两个核心概念为理论出发点,构建出经济不对称依赖权力发挥效用的根本机理,并尝试回答为何在某些情况下权力会失效。

二 理解经济地理与政治版图

(一) 经济地理

“经济地理”这一概念借鉴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指向经济活动在地理位置和地理范围方面的聚集现象。简单来说,所谓经济地理就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②产业分布以及要素流动等经济活动并不是均衡存在于一国内部,而是体现出鲜明的地理属性。沿着地理的界线,国家被“无形之手”划分为不同的经济区块。

我们可以从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两方面来识别和衡量经济地理。在一国内部,每个地区往往有着自身独特且相对固定的区域生产模式和产业结构,上升至国家层面,就表现为不同的经济区块有着不同的产业优势、经济要素聚集和行业分工特点等。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经济地理不仅仅表现为国内经济活动的诸项指标方面,而且体现在对外经济活动当中。一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绝非同质化、无差异发展。例如,由于地理位置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的差异,一国内部有些经济板块的

^① Richard N. Haass, ed., *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p. 203.

^② 保罗·克鲁格曼著 张兆杰译《地理与贸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国际贸易对象很可能与其他板块大相径庭,其接受的外来投资也和其他地区不同。

为什么一国内部的经济活动会呈现出显著的地理差异?按照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市场规模效应。具有一定规模的本地市场既能产生“后向关联”——受规模经济影响的产品生产偏好于靠近大规模市场的地理位置,又能产生“前向关联”——一个大规模的本地市场能够支持当地更多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从而降低下游生产商的成本,强化了地方化。二是密集劳动市场。通过将某个产业一定数量的厂商集中在一个地方,产业集中形成了一个专业技术工人共享的劳动市场,这个共享市场对工人和厂商都有利。雇主们会有更多机会找到具有他们所需专业技能的工人,而工人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三是纯粹外部经济效应。经济活动的地方化集中会通过技术外溢产生一些纯粹的外部经济效应,如知识、信息的流动会使得行业集中的地区获益。^①除了上述三个原因之外,地区领导人的初始决策等偶发因素在经济地理的形成过程中也很重要。一旦偶发因素促成了经济地理的初始形成,就会出现一种自我强化的效应,使得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地理差异在较长时间内变得固化,进而形成历史依赖性,难以被改变。^②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经济地理这一概念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其能够揭示现实世界中广泛存在的经济福利的区域性,因此与其他分析工具相比,有着独特的解释力。其一,与经济福利的国家性相比,经济地理能够突破国家硬壳,深入到一国的内部经济结构,有助于审视在国家之内的产业结构、贸易流向、行业聚集和投资吸收等重要经济事实。由于一国内部各地区有着与众不同的生产模式,每个地区在与外部产生贸易等经济联系时也会扮演着相对不同的角色,因此当国内或国际经济发生变化时,全国范围之内各地区的损害/收益往往呈不均等分布:当对国家整体是损害时,某些区域受损害较大,某些区域则几乎不受影响,甚至有些区域会因此获利;当对国家整体促进福利时,有些特定区域的福利提升较大,而其他一些地区甚至可能受损。这意味着经济福利的国家性具有一定的空洞性。

其二,与其他国内政治因素的分析概念相比,经济地理的分析特色在于突出经济利益的地理性,这和重视利益的社会性等传统分析模式有所不同。以往的研究通常选取阶级、行业或产业等具有“人格化”特征的社会行为体为利益主体,并以这些利益主

^① Paul Krugman,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14, No. 2, 1998, pp. 7-17.

^② 盛斌、王岚《多样性偏好、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保罗·克鲁格曼的世界》,载《经济科学》2009年第3期,第80页。

体面临特定经济政策下经济福利的得失作为论证分析的逻辑起点。^①然而,由于经济地理的客观存在,不同社会行为体的经济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地理范围来划界的,社会行为体的存在空间和利益形成都与地理高度相关。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利益不同,其经济政策立场和偏好的政策亦不同。国内或者国际层面的特定经济政策重大变动给一国范围内的不同经济地理板块带来并不相同的影响。一国之内不同经济地理板块受影响的差异性要大于全国范围内不同社会行为体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社会利益或者要素利益在全国范围内表达出来之前,由于国内产业分工和经济地理的存在,在各个地区层面就被分解或者整合起来了。^②

必须要说明的是,经济地理的分析视角和社会行为体的分析视角并不完全矛盾,实际上,如果一国内部没有显著的经济地理差异性,它们之间将存在着重叠的高度可能。然而,由于产业分工等经济活动的客观存在,经济活动的地理化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且固化了不同社会行为体的经济利益和福利。因此,如果采取经济地理为分析单位,可能能够更好地了解其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

(二) 政治版图

“政治版图”是对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理论和政治割裂(political cleavage)理论的结合研究。顾名思义,政治地理学是关于政治行为与地理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主要研究政治活动的地理因素和地理的政治意义。^③而政治割裂是探讨在一国内部重要的政治行为者之间明显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分裂,这些分裂有着严重结构化和持久化的界线。^④基于上述两种定义,政治版图有两大要素:其一为一国内部不同行政区域在各种政治议题上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和政治活动的长期差异性。其二,这种差异性以一种空间分布的状态存在,呈现出显著的地理特性,是“通过根植于

^① 钟飞腾《社会行为体政策偏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微观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第54-60页。关于国际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影响,还可参见迈克尔·J·希斯考克斯著《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Fiona McGillivray, *Privileging Industry: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2。

^② Peter Trubowitz,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③ Kevin R. Cox, Murray Low and Jennifer Robinso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8, pp. 21-58。

^④ 关于政治割裂理论,可参见Stephen Whitefield,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Post-Communist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2002, pp. 181-200; Seymour M.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in Seymour M.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人们所生活的地方或地理环境中的政治行为来实现的”。^①因此,政治版图主要用以识别政治选择的空间性和地方性,可以被界定为一国内不同区域人群的政治参与倾向,沿着地理的界线形成政治偏好迥异甚至对立的地区或地区联盟。在当代世界政治中,英国内部的苏格兰和英格兰以及加拿大内部的英语区和法语区等案例可谓政治版图存在并对国家政治发挥影响的典型代表。政治版图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种族构成、语言差异、地理距离、宗教信仰、文化区别、政治认同和历史传统等。当然,由于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它们国内不同政治版图形成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与通过政治议题的特定表态来观察政治版图相比,通过对不同政党选举投票情况来理解政治版图更具有可衡量性和指标性。这是由于现代政治中民众的政治参与主要以选举投票形式体现,且政党是不同政治行为体进行选举的主要载体,一国内部不同地理区域民众对不同政党及其候选人的投票支持情况最为直接地反映了政治版图的分布。对特定党派的投票集中度越高,政治版图越明显。政治版图不仅意味着不同地理区域对特定政党的偏好性支持以及对其他政党的选择性排斥,而且这种支持或者排斥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存在,表现出一定的稳定度。事实上,以隐性或者显性的方式出现的政治版图并不是偶然和少数现象,而是在多数国家或多或少客观存在的政治事实。例如,美国民主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西海岸通常会比共和党获得更多的支持,泰国自90年代以来农村地区和城市中产阶级在投票倾向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党派支持差异,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南部和北部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政治立场分歧等。^②

总体而言,一定政治版图内的选民投票倾向具有相当的延续性,会在较长的时间内倾向于持续选择投票给某个政党,造成各选区的投票结果较为稳定,不会出现突然间的变化。这种原因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政治生态中具有高度党派忠诚度的“核心选民(core voter)”的存在。这些核心选民有着强烈的政党认同感,在主要选举中长期持

^① John A. Agnew, *Plac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Ital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 3.

^② 关于美国政治版图的分布情况,可参见 Nicole Mellow and Peter Trubowitz, "Red versus Blue: American Electoral Geography and Congressional Bipartisanship, 1898-2002,"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4, No. 6, 2005, pp. 659-677; Charles E. Cook, "The Equilibrium Elec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2, 2002, pp. 251-256; 关于泰国的政治版图情况,可参见孔建勋《当代泰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表达和政党倾向》,载《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第8-14页;关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版图情况,可参见 Maxim Ryabkov, "The North-South Cleavage and Political Support in Kyrgyz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7, No. 3, 2008, pp. 301-316.

续地投票支持同一政党。核心选民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聚集即形成了政治版图。关于忠诚选民“忠诚”的原因,大致上有政党因素和投票者自身因素两种解释。在政党方面,包括候选人品质、竞选纲领以及党派立场等;^①在投票者自身因素方面,主要关注其个人习惯、家庭氛围和心理状态等。^②无论何种解释更具说服力,核心选民以及政党认同的存在是政治学研究中的客观现象,已被统计数据 and 实证研究所证明。^③理解核心选民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不同政治版图内对不同政党的地区支持稳定度的差异。

然而,一国的政治版图虽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其稳定是相对的。如果政治版图分别被各政党的基本盘所填充以致基本固化,为什么各个政党还要全力投入选举、而且选举结果通常表现出相当的不确定性甚至戏剧性?这是因为在各个地区,除一定规模的核心选民外,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摇摆选民(swing voter)”或“中间选民”。摇摆选民是指那些与忠诚选民相对,投票意向并不固定于特定政党或特定候选人的选民。^④摇摆选民最终将支持哪个政党或候选人,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基本上是游移不定的。除非到了投票那一刻,结果才最终揭晓。各政党在竞选运动中的主要任务就是稳定忠诚选民,争取尽可能多的摇摆选民。摇摆选民成为政党竞争并可能制胜的主阵地,同时也是政治版图各版块间的灰色地带,是政治版图发生动态空间变化的关键因素。^⑤

^① Ron Shachar, “Party Loyalty as Habit Form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Vol. 18, 2003, pp. 251–269.

^② Kevin Denny and Orla Doyle, “Does Voting History Matter? Analysing Persistence in Turnou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3, No. 1, 2009, pp. 17–35.

^③ 例如,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就有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关注。参见 William G. Jacoby, “The American Voter,” in Jan Leigh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merican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75–396; Michael Lewis-Beck, William Jacoby, Helmut Norpoth and Herbert Weisberg, *The American Voter Revisite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p. 138–160.

^④ 威廉·G·梅耶(William G. Mayer)通过定量分析证明,摇摆选民作为一个群体可能拥有以下特征:第一,相比非摇摆选民,摇摆选民较少有党派偏见。第二,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特定议题上,摇摆选民更可能是政治温和派。第三,相比非摇摆选民,摇摆选民可能缺乏足够的政治信息,对政治也更为冷漠。参见 William G. Mayer, *The Swing Voter in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pp. 1–31.

^⑤ 除了这种动态性的政治版图变动外,还有一种以“关键性”选举形式出现的突发性政治版图变动。在关键性选举中,出现了大规模持续的政党选民重组情况。参见张业亮《“关键性选举”与美国选举政治的变化》,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6页。

三 不对称相互依赖下经济地理与政治版图的作用机理

在经济不对称依赖关系中,依赖较小国能对依赖较大国施加权力,其作用逻辑通常表现如下:^①由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存在,依赖较小国谋求权力实现的经济制裁会对依赖较大国的国内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依赖较大国经济福利的相应降低;在依赖较大国内部,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受影响民众将会采取各种方式对本国政府施压影响,要求其答应依赖较小国的目标诉求,选举中的投票是最为重要的影响方式;依赖较小国政府为了赢得选举或者顺利执政,可能会依循受影响民众的意见,答应依赖较小国的要求。因此,不对称相互依赖就产生了权力效用。

在这个逻辑之中,有两大关键要素:其一为经济福利的增减。经济福利的增减是引发后续逻辑的前提条件。在依赖较小国的制裁性经济政策之下,依赖较大国的整体经济福利可能确实受损,但由于经济地理的存在,依赖较大国内部经济福利的增减并非以均质化、均等化的形式出现,而是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便是国内在不同地理区位的同一行业,由于不同的贸易流向,所招致的受益或损失程度也并不一致。总体而言,那些与依赖较小国经济联系密切的地区往往成为利益受损的地区,而其他地区可能不受同依赖较小国中断经济往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通过国内产业区域间转移等原因而从中获益。从此点出发,依赖较大国国内的经济福利得失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地理分割,呈现出区域性特征,因此很难期待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按行业或者要素划界的对政府施压行动,经济地理将会成为是否采取政治行动影响政府的划分依据。

由经济地理出发,难以推导出基于经济利益考量的全国范围的政治行动。这表明即使从经济利益出发,依赖较大国政府也面临着并不一致的国内诉求:一般说来,与依赖较小国经济联系密切的地区往往是利益受损的地区,这些地区倾向于对政府施加压力,使其答应依赖较小国的政治要求;而不受两国中断经济往来影响、甚至可能因此而获益的地区或是与依赖较小国有甚少经济联系的地区,这些地区倾向于向政府施压,要求其拒绝依赖较小国的政治要求或是对此采取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那些利益受

^① 事实上,经济不对称依赖凭依发挥权力效用的手段并不局限于中断现有经贸联系之类的经济制裁手段。还有一种可能,依赖较小国采取经济激励的方式,利诱依赖较大国答应它的要求。但是,本文将逻辑起点限定为中断现有经贸联系所导致的经济依赖的福利锁定,是因为一国政府一般不会公开或大规模地宣传他国对本国的“胡萝卜”政策,选民因此也就不会把自身经济福利的增加归功于国外援助。关于积极的经济制裁效果分析,可参见宋国友《经济劝服战略的理论研究》,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4期,第54-60页。

损的地区倾向于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其答应依赖较小国的政治要求,而那些经济利益没有受损甚至有可能从中受益的地区,容易从“民族主义”出发向政府施压拒绝依赖较小国的政治要求或是采取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

其二,经济福利仅仅是影响依赖较小国政府决策的一个方面,经济利益受损者基于经济地理及其相关利益的游说并不一定能够决定政府的最终政策。国内民众对政府支持的政治版图分布是不对称经济依赖发挥权力效用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政治版图的出现使得依赖较大国政府的最终决策更为复杂化。即使利益受损地区在依赖较大国的国内经济中占据了重要份额,依赖较大国也不一定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答应依赖较小国政府的要求。因为依赖较大国制定决策不仅基于经济福利得失的考虑,更基于能否赢得选举或者继续执政的评估。此时就必须考察政治版图的影响。在依赖较大国内部,无论是执政党还是主要在野党,都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版图,政党将主要根据政治版图的主导意愿来制定政策。

为更好地考察不对称依赖条件下依赖较小国对依赖较大国的经济手段能否产生权力效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这两大变量的简约模型。从经济地理角度出发,依赖较大国国内的经济区块基本可以划分为经济利益受损(A)和相对不受损(B)两类区域;以是否答应依赖较小国的诉求为划分标准,依赖较大国政府执政党的政治版图可以分为支持的版图(C)和反对的版图(D)。该模型要讨论的是,如果经济利益受损地区在全国的经济重要性超过或大致等于相对不受损地区的经济重要性时,即“ $A \geq B$ ”时,在政治版图的约束下,依赖较大国政府会做出什么样的政策选择。

表 1 依赖较大国政府的政策选择

经济地理		不同区域经济福利损失分布	
		$A \geq B$	
政治版图	$C > D$	契合→答应→权力生效	
	$C < D$	错位→拒绝→权力失效	

图表来源: 笔者自制。

从该简约模型中可知,如果政治版图与经济地理基本错位,即与依赖较小国经济利益更为攸关的地区并非执政党的主要选票来源,而且支持执政党的政治版图主流态

度是反对答应依赖较小国的政治或安全诉求,那么此地区就无法基于经济利益的原因有效对政府施加压力,依赖较大会拒绝依赖较小国的政治或安全诉求,依赖较小国的不对称依赖权力就因此可能失效;反之,如果政治版图与经济地理大致契合,即与依赖较小国经济利益更为攸关的地区同时也是执政党所必须倚重的主要选票来源地,那么该地区就可以有效地对政府施压。此时,依赖较小国的不对称依赖权力就很可能生效。

关于这个模型,还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依赖较大大国的政策选择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执政党的选择。执政党是个动态概念,既包含当前的执政党,也包括将来的执政党。显然,赢得选举胜利才能成为执政党。政治版图通过选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总体而言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现象。但从地理空间的具体分布情况看,两者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合。^①正是这种程度不一的重合,增加了政治版图和经济地理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第三,经济地理会对政治版图产生影响。经济地理本身既可能促使政治版图形成,也可能使已基本固化的政治版图发生动态变化。

四 案例分析:俄罗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在确立了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这两大分析框架后,本研究将以俄罗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为案例,对该分析框架进行验证。之所以选取该案例主要是因为其具有典型性:首先,乌克兰对俄罗斯存在着严重的经济不对称依赖,特别是在能源方面。其次,俄罗斯试图对乌克兰施展权力,要求乌克兰遵从俄罗斯的核心政治要求,放弃加入北约。最后,乌克兰国内经历了选举,且国内存在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

(一)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不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等因素的作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不对称依赖在苏联时期就已存在。苏联中央政府通过“调配资金、技术、资源、价格和市场等因素,使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地区分工和产业

^① 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地理的差异造就了特定利益的地理差异,特定利益的地理差异继而又通过政治代表制导致了政治偏好上的地理差异。参见 Peter Trubowitz, "Political Conflict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Ge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Issue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6, pp. 395-411。

分工”。^① 即使乌克兰独立多年,乌克兰仍旧难以在经济上摆脱对俄罗斯的全面严重依赖。这种全面的不对称性体现在贸易、能源、债务和投资等四方面。

1. 贸易和能源方面

俄罗斯一直是乌克兰的最大贸易国。根据表 2 计算,在 2001 - 2009 年间,平均而言对俄罗斯的出口占乌克兰出口的 21%,从俄罗斯的进口更是超过 33%。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体现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的贸易依赖并没有显著降低,而是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高水平。

在能源方面,乌克兰本身是能源产量极低的国家,生产所需的大部分能源依赖进口,特别是从俄罗斯的进口。因此在能源领域,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依赖表现得极为明显。同样根据表 2,乌克兰从俄罗斯进口的矿物燃料接近其全部进口总额的六成。

表 2 2001 - 2009 年俄罗斯在乌克兰贸易中的比重

年份	俄罗斯占乌克兰 出口比重	俄罗斯占乌克兰 进口比重	俄罗斯对乌克兰 矿物燃料等出口
2001	22.42%	37.02%	54.36%
2002	17.61%	37.36%	60.99%
2003	18.53%	39.00%	68.79%
2004	18.02%	40.74%	74.95%
2005	21.86%	35.54%	68.45%
2006	22.54%	30.61%	54.59%
2007	25.72%	27.75%	49.50%
2008	23.50%	22.70%	38.01%
2009	21.40%	29.13%	55.96%
平均份额	21.29%	33.32%	58.40%

数据来源:2000 - 2003 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贸易数据来自 IMF, *Ukraine: Statistical Appendix*, 2005; 2004 - 2009 年数据来自 State Statistic Committee of Ukraine, “Ukraine’s Foreign Trade in Goods (Monthly Information)” 和 “Ukraine’s Foreign Trade in Goods with EU Countries”; 俄罗斯对乌克兰矿物燃料等出口数据来自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UNcomtrade。

^① 张弘《冲突与合作——解读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1991 - 2008)》,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 页。

2. 债务方面

自独立之后,乌克兰政府即一直为债务问题所困扰,官方外债常年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5%以上。^①乌克兰对外债务大致上分三部分:一是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多边债务,二是欠俄罗斯、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双边债务,三是其他一些以债券形式表现的商业债务。就国家而言,俄罗斯一直是乌克兰最大的外部债权持有国,其债务份额要远远多于其他对乌克兰具有潜在影响力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俄罗斯所持的乌克兰债权要超过乌所有的外部债权国所持债权的50%以上。^②

3. 投资方面

由于历史原因,俄罗斯资本几乎存在于乌克兰所有的经济核心产业当中,不仅在能源依赖型行业中居于绝对垄断地位,而且在其他战略性行业也有着广泛的投资。据统计,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资本占乌克兰炼油行业的90%、冶金行业的66%、铝业的90%、通信行业的38%和电力行业的36%。^③而根据2002年的计算,仅冶金生产企业就占乌国内生产总值的23%、外汇收入的47%。^④显而易见,通过对乌克兰国家经济命脉产业的大量直接投资,俄罗斯财团不仅能获得高额利润,还能影响到乌克兰国民经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几个衡量经济相互依赖的关键指标方面,乌克兰却对俄罗斯缺乏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以能源为主要标志,可以认为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双边经济关系中,享有极为显著的经济优势。

(二) 乌克兰的“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

基于对历史经验、经济结构、种族构成、与周边国家联系及语言、宗教、文化等因素的考察,我们会发现,乌克兰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域划分。这种划分在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两方面均有体现。

1. 经济地理

乌克兰的经济格局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东西差异”的地理分布。乌克兰东部是工

^① Hrant Bagratian and Emine Gtirgen, “Payments Arrears in the Gas and Electric Power Secto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Ukraine,” IMF Working Paper,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wp97162.pdf>.

^② IMF, *Ukraine: Statistical Appendix*, February 2007, p. 40.

^③ Nataliya Blyakha, *Russi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Ukraine*, Electronic Publications of Pan-European Institute, No. 7, 2009, p. 9.

^④ 美联社莫斯科2002年5月24日电,转引自赵鸣文《俄美对乌克兰争夺态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2期,第15页。

业聚集区,而西部主要是农业区,中部则处于农业和工业混合状态。如果以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衡量,乌克兰东部地区无论是独立前还是独立后都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乌克兰东部的的主要产业为采煤业、金属制造与化工产品生产,这些产业及相关行业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都离不开俄罗斯,由此形成了高度互补但依赖的产业分工。^①事实上,在苏联时期,乌克兰东部与俄罗斯南部同属于苏联南方工业区,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除了产业分工的紧密联系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投资也多数集中于东部工业地区。这加深了乌克兰东部与俄罗斯的经济地理特征。由于工业发达,东部地区是乌克兰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

与东部和俄罗斯密切的经济联系相比,乌克兰西部地区历史以来就与俄罗斯之间保持着松散的经济关系,即使在苏联时期也是如此。从产业分工看,乌克兰西部主要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农村化程度很高,这造成乌克兰西部的经济生产方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自给自足特征,不但与俄罗斯的联系不密切,甚至与乌克兰东部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关系。从对外贸易看,由于地理因素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乌克兰西部的贸易对象主要为中欧和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而非俄罗斯。乌克兰西部地区向欧洲国家出口原材料和部分农产品,同时从欧洲国家进口部分工业品和生活消费品。^②与东部相比,乌克兰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相对较低。

2. 政治版图

乌克兰共有 27 个地方行政区。^③以对俄罗斯的态度衡量,这 27 个行政区根据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政治立场分布,大致上形成两大政治版图。

第一,东部和南部。乌克兰东部地区包含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扎波罗热州、哈尔科夫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该地区在 17 世纪中叶就被纳入沙俄统治之下,是乌克兰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与克里米亚相邻,同样在血缘上更接近俄罗斯人,也更加俄罗斯化。例如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38% 的人口为俄

^① Stephen Shulman, "Asymmetrical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Ukrainian National Disunit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8, No. 8, 1999, pp. 921 - 922.

^② Stephen Shulman, "Asymmetrical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Ukrainian National Disunity," pp. 921 - 922.

^③ 这 27 个行政区域包括 24 个州、2 个直辖市和 1 个自治共和国,分别为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尼古拉耶夫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州、苏米州、波尔塔瓦州、基洛夫格勒州、切尔卡瑟州、文尼察州、赫梅利尼茨基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捷尔诺波尔州、切尔诺夫茨州、利沃夫州、伊万-弗兰科夫州、外喀尔巴阡州、沃伦州、切尔尼科夫州、基辅直辖市、塞瓦斯托波尔直辖市、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

罗斯裔,而且过半数的乌克兰裔母语为俄语。东乌克兰不仅与俄罗斯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跨境联系,而且维持这种密切联系以及保护俄罗斯裔和母语讲俄语者的权益地位是该地区人民首要关切的事务。^①

乌克兰南部地区主要包括赫尔松州、尼古拉耶夫州、敖德萨州、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直辖市。该地区有着相当数量的俄罗斯裔,且大部分集中于城市。此区域的乌克兰国家认同感也较低。特别在敖德萨州及其周边地区,当地的居民已经高度俄罗斯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南部的一个特殊地区,其人口和历史等多方面都与俄罗斯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如今它是乌克兰俄罗斯裔居民占多数(2005年为59%)的唯一区域。^②因此,克里米亚半岛的民众仍对俄罗斯或苏联有着十分强烈的归属感,乌克兰独立之后,许多俄罗斯人和克里米亚居民都希望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

第二,乌克兰西部和中部。乌克兰西部有罗夫诺州、捷尔诺波尔州、切尔诺夫茨州、利沃夫州、伊万-弗兰科夫州、外喀尔巴阡州和沃伦州等7个州。与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相比,该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种族构成和经济结构。此区域人口的绝大部分是乌克兰裔,通行语言为乌克兰语,并且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习俗。相比东乌克兰人,西乌克兰人更加认同自己的乌克兰人身份。西部有着较深的“反莫斯科”情绪,生活在此的俄罗斯裔寥寥无几。特别是像在利沃夫州、伊万-弗兰科夫州、捷尔诺波尔州这三个西部州中,西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往往十分强烈。^③

除了上述东部、南部和西部的17个行政区之外的10个行政区(含基辅直辖市)均属于乌克兰中部区域。该地区的大部分人口使用乌克兰语。中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如西部那样高涨。自乌克兰独立以来,中部奉行相对温和的政治路线,既部分接受西部的民族主义吁求,也对东部的亲俄罗斯政治行为有所回应。不过总体上,乌克兰中部地区经历了斯大林时代的饥荒和对乌克兰民族认同的高压遏制,该地区也存在

^① Paul Kubicek, "Regional Polarization in Ukraine: Public Opinion, Voting and Legislative Behavior,"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2, No. 2, 2000, p. 274.

^② 克里米亚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原因只是由于1954年当乌克兰还处于苏联统治的时候,为了庆祝俄乌友谊,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的管辖权移交给了乌克兰。关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政府的关系,可参见Janusz Bugajski, "Ethnic Relations and Regional Problems in Independent Ukraine," in Sharon L. Wolchik and Volodymyr Zvighyanich, eds., *Ukrain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al Identi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pp. 173-175.

^③ 关于西乌克兰地区的历史、政治和传统,可参见保罗·库比塞克著,颜震译《乌克兰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88、104-108页。

着流行的反俄罗斯思潮。^①

(三) 俄罗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及经济政策使用

乌克兰对俄罗斯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乌克兰独立之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外交政策核心和首要权力诉求是竭力将乌克兰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确保乌克兰继续留在独联体内部,保持与俄罗斯的密切政治和安全关系,使其成为俄罗斯面对美国和北约压力的缓冲地带。但与俄罗斯的期待显然不同,乌克兰总体上对俄罗斯怀有疑虑甚至敌意,认为俄罗斯是其民族国家建构和安全维护的主要威胁,因此自独立以来就力图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主导和控制。俄、乌在彼此定位上的分歧在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这一问题上得到集中表现。^②

2004年乌克兰总统选举期间,俄罗斯大力支持亲俄的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亚努科维奇(Viktor Fedorovych Yanukovich),但由于“橙色革命”的原因,最终是“亲西厌俄”的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尤先科当选总统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为了防止此种情况发生,俄罗斯迅速利用其在俄乌不对称依赖关系中的有利地位,试图施展权力,改变乌克兰的外交政策,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在所有的经济政策中,最为明显和最为有力的当属俄罗斯其后对乌克兰所采取的能源政策。能源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提高天然气价格作为一种惩罚和制裁措施来迫使乌克兰的尤先科政府改变一心向西的外交政策趋势。之所以如此,如前所述,是因为能源不仅是俄乌贸易的最重要内容,而且是俄乌不对称经贸关系的关键,是乌克兰高度依赖俄罗斯的主要来源。^③

2005年,俄罗斯以国际市场价格调整为由,突然取消了此前与乌克兰达成的50美元/立方千米的2006年特惠供气协议,要求按照230美元的价格出售,并要求乌克兰偿还历年所欠数十亿美元的天然气欠款。^④如果俄罗斯这一诉求得以实现,将会在经济上掏空乌克兰。乌克兰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为了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价格

① 关于乌克兰政治版图的分析,可参见 Sarah Birch, "Interpreting the Regional Effect in Ukrainian Politics," *Europe - Asia Studies*, Vol. 52, No. 6, 2000, pp. 1017 - 1041.

② 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一关键问题之外,俄乌双边关系分歧在黑海舰队划分、债务分配、海军基地租借以及乌克兰是否加入独联体等方面均有体现。

③ 大体上,俄罗斯对乌能源政策包含三个组成部分:提高售乌天然气价格、减少对乌能源供应以及要求乌克兰偿还能源欠款。但总体上,提高售乌天然气价格为主要手段。

④ 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天然气供应谈判分别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和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Naftogaz),考虑到这两大公司均为各自政府所拥有,因此事实上是政府行为,所以在后文中均以俄罗斯和乌克兰代替此两大公司。

格,俄罗斯在2006年1月一度停止向乌克兰供气2天。^①在双方的妥协之下,2006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出口价格上升为95美元。2006年的天然气价格协定才维持了一年,2006年年底,俄罗斯又对乌克兰提出2007年的新天然气价格,要求每立方千米价格为130美元,乌克兰最终接受了这一价格。俄乌关于2008年天然气价格的谈判重复了此前的历史,俄罗斯继续提高要价,双方协商之后以179.5美元/立方千米达成交易。^②2009年俄乌天然气价格的订立过程更是波折不断,影响深远。俄罗斯起先提高要价至250美元/立方千米,但乌克兰认为201美元/立方千米才是合理价格,遂不接受。俄罗斯随后宣布价格再次提高至418美元/立方千米。由于未能达成协议,俄罗斯再次全面中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在欧盟的斡旋下,双方同意2009年俄对乌供气价格将在欧洲价格基础上给予20%的折扣。^③该年,俄供乌天然气价格平均高达259美元/立方千米。

(四) 不对称权力效果及解释

尤先科当选总统后,把北约看做是免受俄罗斯控制的最可靠的保护伞,宣称加入北约符合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及对外政策取向,是乌克兰不变的国家战略目标。为加入北约,尤先科不顾俄罗斯的各种能源惩罚措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他明确表示有兴趣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NATO Membership Action Plan),为最终成为北约成员国努力。随后,乌克兰和北约在2005年4月就成员国地位问题开展了密集对话。乌克兰派遣军队承担了北约在科索沃和阿富汗的维和行动以及在伊拉克的军事训练任务。2006年4月,尤先科批准北约在其境内举行“海上微风2006”的军事演习。虽然该演习由于国内当地居民的反对而停止,但2006年12月,尤先科总统又支持乌克兰海军参加北约在地中海名为“积极努力”的军事演习。^④2008年1月,乌克兰外长正式向北约秘书长递交了由总统尤先科和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等人签署的申请书,请求北约在即将举行的布加勒斯特首脑会议上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爆发战争后,尤先科更是加快了申请加入北约

^① Peter Rutland, "Russia as an Energy Superpower,"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3, No. 2, 2008, p. 208.

^② Simon Pirani, Jonathan Stern and Katja Yafimava, *The Russo-Ukrainian Gas Dispute of January 2009: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Working Paper,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February 2009, p. 21.

^③ 李志业《俄乌天然气争端及其政治经济背景分析》,载《国际石油经济》2009年第1期,第27页。

^④ Jeffrey Simon, "Ukraine Needs to Decide Its Strategic Alignment,"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9, No. 3, 2009, pp. 370-372.

的进程。

乌克兰的“亲西疏俄”外交战略不仅表现在军事上不断接近北约,而且在其他重要方面也有直接体现。2008年2月,尤先科宣布与欧盟正式开始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谈判。2008年9月,乌克兰与欧盟谈判签署联系国协定,以深化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2009年5月,乌克兰与欧盟签署《东部伙伴关系宣言》,简化其公民进入欧盟的签证手续以及加强能源和安全领域的合作。^①此外,乌克兰在其他方面也屡次挑战俄罗斯的重大战略利益。2005年12月,尤先科推动了由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成立的“民主选择共同体”。该共同体被普遍认为是对抗俄罗斯的产物。^②在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期间,尤先科政府在政治上支持格鲁吉亚、谴责俄罗斯,在军事上向格鲁吉亚提供武器,并限制俄黑海舰队行动。

由此可见,在尤先科当政期间,俄罗斯未能借用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手段成功改变乌克兰的外交决策,从而实现权力效用。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与乌克兰国内政治版图和经济地理的错位高度相关。

支持尤先科的政治版图主要存在于乌克兰的中西部。在2004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尤先科赢得了除东部和南部10个行政区外其他所有17个行政区的胜利。在这17个行政区,尤先科的得票率均在63%以上。尤其在西部的7个行政区,尤先科的得票率高达89%。在中部的10个行政区,其总体得票率也有76%。但在乌东部和南部,尤先科却遭到惨败,特别是在最东部的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其得票率分别只有6.2%和4.2%。与中西部相比,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支持和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的地区党候选人亚努科维奇。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亚努科维奇以显著优势赢得了东部和南部地区的10个行政区,但与尤先科东部的遭遇高度类似,他在乌克兰中西部地区以极大差距落败。^③在政治版图的作用下,当选总统尤先科制定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为是否迎合了中西部选民。而传统上,中西部地区的政治倾向一直为亲西方、支持乌克兰国家独立地位、推动乌克兰民族构建和反对俄罗斯的大国主义。^④

尽管整体而言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经济非常重要,俄罗斯也对乌制定了惩罚性的

① 赵怀普《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6期,第82页。

② 赵华胜《“颜色革命”后欧亚地区形势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1期,第29页。

③ Ralph S. Clem and Peter R. Craumer, “Shades of Orange: The Electoral Geography of Ukraine’s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s,”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46, No. 5, 2005, pp. 374–375.

④ Ivan Katchanovski, “Regional Political Divisions in Ukraine in 1991–2006,”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4, No. 5, 2006, p. 507.

经济政策,试图把乌克兰的经济影响力顺利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施展不对称依赖权力,进而改变乌克兰的西向战略,但由于乌克兰国内经济地理东西差异的存在,经济政策的主要受力对象为能源、冶金和化工产业集中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少数地区,而对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西乌克兰和中部绝大部分地区几乎无法产生直接且重大影响。受俄罗斯经济政策的刺激,乌克兰东部地区有强大意愿希望乌政府照顾俄罗斯的政治利益,改善与俄的外交关系。然而,由于政治版图的存在,这些诉求无法在乌克兰的中西部引起共鸣,因此也无法对中央政府产生压倒性影响。

五 政治版图的变化性

在分析政治版图、经济福利和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权力效用,结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案例,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如下两个重要问题,以更准确地理解其长期效用和机理。

(一) 政治版图的动态变化性

政治版图虽然具有长期的相对稳定性,但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种稳定性不会完全固化,而会呈现出一定的动态变化性。政治版图的变化有两种可能性:一为质的选举立场变化,即特定政治版图扭转了传统的政治倾向性,转而支持曾经反对的政党及其候选人;二是程度上的选举立场变化,即特定政治版图虽然还是持有传统立场,但立场有所削弱。在乌克兰2010年的总统选举中,亚努科维奇仍然在东部和南部的10个行政区赢得了胜利,而且,这10个行政区的支持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西部和中部的政治版图虽然同样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程度变化。季莫申科赢得了中西部17个行政区,并且在西部的若干州以接近90%的投票率绝对领先,总体得票率却大幅下滑。特别是在中部地区,下滑程度更为明显。^①比较2004年和2010年的乌总统选举,政治版图仍然存在,但一定政治版图内“摇摆选民”投票变化的累加所形成的集体效应会冲破政治版图的投票结构,进而改变全国层面的选举结果。

(二) 经济地理对政治版图的缓慢影响

旧有政治版图的内部为什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摇摆选民为何会改变投票立场?还是要回到经济地理及其所暗含的经济福利因素。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不是

^①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 Ukraine, <http://www.cvk.gov.ua/pls/vp2010/WP313?PT001F01=701>.

相互彻底隔离、完全互不影响的。^① 在俄乌关系这个案例中,由于东西差异这一经济地理的存在及其与政治版图的错位,短期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经济制裁政策似乎不能影响到乌克兰中西部选民的经济利益,因此也无法改变尤先科政府的西向战略。但长期而言,经济地理会对政治版图产生缓慢影响。特别是考虑到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经济份额占到乌克兰经济的半壁江山,东部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对包括中西部在内的乌克兰整体经济带来相当程度的负面效应。这些影响会通过国民生产总值缩水、国内消费急剧下降、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对外债务攀升以及国际贸易逆差增大等方式加以体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乌克兰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俄罗斯持续数年的天然气价格提高推动了乌克兰国内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使得乌克兰一度成为世界上通货膨胀率第三高的国家,严重影响了全体乌克兰民众的正常生活。^②

即便乌克兰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总体上乌克兰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版图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像选举结果所揭示的,该地区的大多数民众仍然支持政府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如表3所示,截至2010年,亲俄阵营和亲西方阵营(2010年为季莫申科竞选)仍占据着各自基本的政治版图,但这种地域差异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尤其是与2004年相比,亚努科维奇从中西部获取的选票份额明显增加。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因为经济原因对尤先科不满的摇摆选民在2010年的总统大选中选择了主张缓和与俄罗斯关系的亚努科维奇,从而帮助其赢得了全国大选。^③ 以东部和南部为根本的亚努科维奇当选后,不仅宣布撤销加入北约的申请,并正式表示不考虑乌克兰加入北约事宜。^④ 为了表达这一决心,乌议会还制定了《内外政策原则法》,以法律形式排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等军事集团的可能性。^⑤ 由此也完成了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从错

^① 有学者甚至认为,政治行为的区域模式系统性地与不同区域的生产模式相关,不同区域生产模式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地理是政治版图差异的主要原因。参见 William Brustein, "Mapping Politics: How Mode of Production Counts in Electoral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5, No. 2, 1996, pp. 153-158.

^② Anders Aslund, *How Ukraine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and Democracy*, Washington, D. 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p. 229.

^③ 不可否认,在乌克兰2010年的总统选举中,亲西方阵营的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的内斗对选民投票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但正如有学者曾论证过的那样,乌克兰东西部选民基于“亲西方”和“亲共产主义、亲俄”的倾向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投票模式,并且因此形成了较为巩固的立场差异的政治版图。参见 Ivan Katchanovski, "Regional Political Divisions in Ukraine in 1991-2006,"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4, No. 5, 2006, pp. 507-532。乌克兰2004年之后的议会选举和2010年的总统大选也大体印证了这种投票模式和政治版图的客观存在。因此,亲西方阵营内的候选人变化并不会对选民的投票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④ F. Stephen Larrabee, "Russia, Ukraine, and Central Europe: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3, No. 2, 2010, p. 42.

^⑤ 李自国《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对外政策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第55页。

位、位移,继而到大致契合的过程。^①

表3 两大政治版图对候选人总得票数的贡献率

地区 \ 候选人	亚努科维奇		尤先科/季莫申科	
	2004年	2010年	2004年	2010年
东部和南部	81.34%	74.39%	17.43%	18.51%
中部和西部	18.66%	25.61%	82.57%	81.49%

数据来源:根据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数据计算得出。2004年总统大选结果,可参见 <http://www.cvk.gov.ua/pls/vp2004/WP313?PT001F01=502>; 2010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可参见 <http://www.cvk.gov.ua/pls/vp2010/WP313?PT001F01=701>。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观察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不对称依赖条件下的权力失效问题,构建了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的初步解释框架,认为由于一国内部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的客观存在以及两者之间的错位现象,制约了依赖较小国对依赖较大国的权力诉求实现,导致经济影响力难以顺利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基于本文分析,依赖较小国要解决权力失效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力量的作用,有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不能只看重甚至迷信与依赖较大国国家层面的不对称经济联系,比如贸易依赖或者投资依赖等,并想当然地认定这种不对称经济相互依赖会自然带来权力效用。不对称相互依赖所产生的经济福利本身并不能自动带来依赖较大国外交政策的改变,经济福利的得失必须通过政治影响(特别是选举)的变动才能对依赖较大国政府发挥影响。然而,在一个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并不重合的国家,可能存在着两者之间“传导断裂”的现象。这很可能会带来权力的失效。因此,对于依赖较小国,若想借助经济手段,首先必须要加强对依赖较大国内部政治经济状况的了解,深入分析其经济地理和政治版图。

^①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俄乌关系中,经济地理对政治版图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主要是因为乌克兰东部占乌克兰国家经济的比重过大,且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过高。

第二,选举以及与选举高度相关的政治版图是依赖较大国政府最终决策的最大影响因素,由于政治版图变动的不确定性以及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依赖较小国不应过于卷入目标国的国内政治斗争,也不应过于明显地支持某个候选人。选举体制意味着存在政党轮替的可能,依赖较小国要着眼于长远,积极扩大本国在目标国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以及在前两者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基础,使两国之间真正形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从而根本上塑造目标国的外交政策偏好。在这个意义上,依赖较小国的正确选择是要进一步扩大与依赖较大国的经济联系,不能将经济联系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而是要拓展依赖较大国可以从中受益的经济地理,然后相应地扩大受影响的政治版图,从而影响目标国的决策。

第三,虽然在经济福利和政治版图的限制下,权力效用可能很难在短期内立即实现,从长远来看,扩大经济接触为更好地影响依赖较大国的最佳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依赖较小的经济大国不应使用经济制裁手段。即使权力无法短期内迅速奏效,在必要的情况下,依赖较小国仍应使用制裁性或惩罚性的经济手段。依赖较小国使用经济手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可以据此衡量其对目标国经济的实际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借此清晰有力地表明自身的决心和意愿,并因此阻遏依赖较大国可能选择的更为不利于依赖较小国的政策。

[收稿日期:2012-05-10]

[修回日期:2012-06-18]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contrast , the U. S. economic pattern mainly relied on domestic market , which had relatively less impact on Britain and facilitated a peaceful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the U. S. and Britain. Based on a trans – historical and trans – regional comparison ,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at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s have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nsequences ,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needs domestic foundation. Therefore , expanding domestic market is critical for great powers to achieve peace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of great powers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nsequence , power transition

【Author】 Huang Qixuan , Assistant Professor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 Political Bloc , and the Power in Asymmetrica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Song Guoyou Gao Qunbo (131)

【Abstract】 There' s an interesting puzzl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t asymmetr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doesn' t bring effective power. The less dependent actor which is predominant in an interdependent dyad couldn' t transform its economic influence into political influence by using economic means , and thus fails to exercise its power over the more dependent actor.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 , the author constructs a new explanatory model by utilizing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bloc , and argues that whether economic geography can match with the political bloc is crucial to the power from asymmetr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case study of Russia taking advantage of its predominant position to prevent Ukraine from joining NATO bolsters core viewpoint presented by this article.

【Key Words】 economic geography , political bloc , 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 power

【Authors】 Song Guoyou , Associate Professor in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Gao Qunbo , Master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at Fudan University.